

**编者按**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北极研究逐渐发展起来,相比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国的北极研究是新领域,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学术价值。那么,中国的北极研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已经取得哪些成绩,有哪些最新的研究动态?国外学界在北极研究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有哪些值得中国学界借鉴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中国的北极研究有哪些不足,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国科学院大学徐庆超助理研究员。徐庆超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极研究、外交转型、国际话语权与公共外交,代表作有:专著《崛起之翼: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的中国—北极共生关系》(拟于 2021 年 11 月出版)《崛起之困?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和论文《北极安全战略环境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北极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相关研究综述》等。

##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北极研究: 进展与问题

——徐庆超助理研究员访谈

徐庆超 王海媚

### 一、中国北极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请问中国的北极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中美俄在北极的战略竞合研究”(项目批准号:20BGJ045)的阶段性成果。

徐庆超(以下简称“徐”):对于国内学界何时开始关注北极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看法不尽一致,有三个时间点可供参考:一是 2004 年。大连海事大学极地海事研究中心教授李振福等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北极问题研究的文献从 2004 年才开始出现,并且当时的文献更多的是介绍性的研究,还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已经体现出了中国学者对于北极人文社科问题的高度关注”。<sup>①</sup>二是 2007 年。在 2012 年的报告中,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等认为,“十年前在自然科学和环境研究领域以外,鲜有中国人关注北极。2007 年,在俄罗斯探险家将国旗插到北极点以下的海底后,中国的战略思想家开始对北极产生了地缘政治兴趣。自那时起,中国政府官员和社会科学研究者要为至少在夏天可进入北极大部分地区那一天到来而做准备意识逐渐苏醒。”<sup>②</sup>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王晨光也认为,“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对北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 2007 年”。<sup>③</sup>三是 2009 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生赵华和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匡增军的研究发现,2007 年之前在中国国际政治类核心杂志上没有北极研究论文,“国内国关学界北极研究是在 2007 年以后逐渐开始的,更确切地说是在 2009 年以后兴起的。……2009 年是国内国关学界北极研究的起始年份。”<sup>④</sup>

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最主要的文献来源进行追溯,可以发现,2007 年 8 月,俄罗斯科考队在北冰洋洋底的“插旗”事件确实引发了北极讨论热潮。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吴慧教授发表的《“北极争夺战”的国际法分析》一文是目前可查到的我国社会科学领域较早关于北极的规范学术文章,<sup>⑤</sup>引起人们关于“世界尽头的争夺战”的关注。我在 2017 年发表的论文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

① 李振福、李诗悦:《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发展脉络、支撑体系和学科发展》,《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13—158 页。

② Linda Jakobson and Jingchao Peng, “China’s Arctic Aspirations,” *SIPRI Policy Paper*, No.34, Nov. 2012.

③ 王晨光:《中国北极人文社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 CSSCI 期刊的统计数据》,《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第 78—84 页。

④ 赵华、匡增军:《中国学者的北极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国际政治类核心杂志(2007—2016)》,《战略决策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69—102 页。

⑤ 吴慧:《“北极争夺战”的国际法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 年第 5 期,第 36—42 页。

的北极研究追溯至 21 世纪初,<sup>①</sup>未提及具体年份,但强调 2006 年底中国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对社会科学界或是一个触发点。

鉴于此,对于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北极研究出现的时间点,个人倾向于 2007 年。但是,国内学者对北极在学术意义上的关注可能要更早一些,大致可以认为始自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因为成果产出毕竟也是需要时间。

王:如何评价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北极研究状况?

徐:有一些英文文献涉及对 21 世纪以来中国北极研究的评价。雅各布森发现,自 2005 年左右,尽管在中国没有一家研究机构专注于北极研究,但也有部分人发表了一些关于北极战略和地缘政治的文章。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副教授戴维·怀特(David Curtis Wright)认为,中国国内关于北极的学术文章的发表量在 2009 和 2010 年达至“全盛期”,而这些文章的多样性(Multiplicity)和不和谐(Cacophony)表明中国北极政策的流动性和暂时性。挪威南森研究所研究员伊思琳(Iselin Stensdal)的研究认为,亚洲的极地研究一向是“南极优先”(Antarctica First),从主题上自然科学主导了中国的北极研究。<sup>②</sup>在 2004—2013 年,国内学者关于北极政策和治理的文章占比较重,这些文章均发表在 2008 年后,与美国国家地质勘探局(USGS)2008 年发布关于北极地区未探明的油气潜能评估报告后引发的全球关注相吻合。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琳(Anne-Marie Brady)认为,中国在极地的存在大致在 2002—2012 年间经历了一次“大跃进”,在极地考察上,中国每年的花费十年间翻了三倍,但中国并没有在北极项目上大量投入——只有 20% 的极地项目经费投在北极(其他的皆用于南极)。

以上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的观察,除普遍认为中国北

---

① 徐庆超:《“未定之域”:中国北极研究十年述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第 1—8 页。

② David Curtis Wright, “The Dragon Eyes the Top of the World: Arctic Policy Debate and Discussion in China,” *China Maritime Study*, No.8, Newport, RI: U. S. Naval War College, Aug. 2011; David Curtis Wright, “China’s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Arctic,”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15, Issue 2, 2013; Iselin Stensdal, “Coming of Age? Asian Arctic Research, 2004-2013,” *Polar Record*, January 2015, pp. 1-10; Iselin Stensdal, “Asian Arctic Research 2005-2012: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FNI Report*, No.3, 2013; Anne-Marie Brady, “Polar Stakes: China’s Polar Activities as a Benchmark for Intentions,” *China Brief*, Vol.XII, Issue 14, July 20, 2012; Linda Jakobson, “China Prepares for an Ice-free Arctic,” *SIPRI Insights on Peace and Security*, No.2 March 2010; Linda Jakobson and Jingchao Peng, “China’s Arctic Aspirations.”

极研究处于上升态势之外,尚未有总体比较全面的评价,但这些观察仍然反映出近些年国际学界在中国与北极主题框架下的集体关切:一方面,他们关注中国北极政策的真实导向及其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投射,所以选取国内的学术讨论片段分析中国在北极的政策和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他们关注持续扩大的北极科考能力对中国开辟航线与资源能源获取的意义,以及在科技能力上中国实施军民融合的可能和意向。

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的梳理和评估起步较晚,但跟进较快。总的看,相关中文文献关注的面向相对丰富,<sup>①</sup>主要情况归纳如下:

其一,知识产出。国内学者较多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文本和数据分析方法,对一定时段和数量的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北极研究文献进行扫描和追踪。论文(包括学位论文)的发表年份、来源期刊、被引次数、基金项目、所属学科、关键词、研究的问题域,以及论文作者和单位等信息,成为他们统计分析的主要内容,但各部分所占比例不尽一致。在样本选择上,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奚源考察的是 2007—2016 年发表的 518 篇学术论文,王晨光选取了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发表截止时间的 260 篇论文,赵华和匡增军将 2007—2016 年在中国国际政治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 92 篇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并将这些样本分为地缘政治、国际机制、北极安全和北极治理四类。<sup>②</sup>关于研究的问题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利等人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北极研究当作整体,认为“中国的北极研究经历了气候变化——北极航道——北极治理的过程。目前为止,针对北极通

<sup>①</sup> 杨振蛟等:《北极治理的中国参与问题研究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第 32—37 页;奚源:《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评估:2007—2016 年》,《国家治理评论》2017 年第 1 期,第 88—95 页;王晨光:《中国北极人文社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 CSSCI 期刊的统计数据》,第 78—84 页;赵华、匡增军:《中国学者的北极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国际政治类核心杂志(2007—2016)》,第 69—102 页;徐庆超:《北极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相关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第 4—16 页;王利等:《基于 Cite Space 的北极研究综述》,《极地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346—363 页;叶滨鸿等:《北极地区地缘关系研究综述》,《地理科学进展》2019 年第 4 期,第 489—505 页;李振福、李诗悦:《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发展脉络、支撑体系和学科发展》,第 113—158 页;李振福等:《国内北极问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综述》,《海洋开发与管理》2020 年第 10 期,第 3—11 页。

<sup>②</sup> 奚源:《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评估:2007—2016 年》,第 88—95 页;王晨光:《中国北极人文社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 CSSCI 期刊的统计数据》,第 78—84 页;赵华、匡增军:《中国学者的北极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国际政治类核心杂志(2007—2016)》,第 69—102 页。

航的文章占据主导”,<sup>①</sup>并就与北极航道经济性相关的中英文文献做了详细比较。

很多国内学者对中国的北极研究的知识产出给予相对积极的评价,认为:“国内社科界北极研究的整体质量较高”,<sup>②</sup>“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和多产的阶段”,<sup>③</sup>且整体上的“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sup>④</sup>而国外学者的一些评论,特别是其中隐含的问题指向,在我们对这些知识产出的国际影响进行评估时可以参考。比如,怀特的一篇文章大篇幅地引用了国内学者的一些文章及其观点,但他同时申明,“我无意更正我所翻译的中文原文中的一些事实性错误”。<sup>⑤</sup>伊思琳也指出,中国学者的文章并不是指向国际读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质量就比英文出版物差,二者不是一回事。<sup>⑥</sup>这在客观上证实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者的英文发表量与中文的差距明显,相应地限制了知识的国际传播。

其二,平台建设。近几年,以国内的大学、机构和智库为依托的北极研究平台在数量上涨势明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研究员杨励、罗颖与李振福等人的研究列举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主要平台,<sup>⑦</sup>其中既有“老兵”也有“新兵”,既有实体也有虚体。从地域上看,上海、青岛、大连和武汉是“老兵”的主要聚集地,而渐次崭露头角的“新兵”主要分布在广州、聊城、哈尔滨及北京等地。

同时有一个趋势日渐显现,即国内的北极研究正在逐步地网络化、国际化,以跨学科、跨地区的“联盟”或“协同创新中心”的名义,力图由点到面地形成覆盖更广的学术交流网络。比如,2013年成立、有国内外11个创始成员的“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发起、国内25所高校联合共建的“中国高校极地联合研究中心”;成立于2020年、致力于统筹整合校内

① 王利等:《基于 Cite Space 的北极研究综述》,第 346—363 页。

② 奚源:《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评估:2007—2016 年》。

③ 赵华、匡增军:《中国学者的北极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国际政治类核心杂志(2007—2016)》。

④ 李振福、李诗悦:《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发展脉络、支撑体系和学科发展》。

⑤ David Curtis Wright, “The Dragon Eyes the Top of the World: Arctic Policy Debate and Discussion in China.”

⑥ Iselin Stensdal, “Asian Arctic Research 2005-2012: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⑦ 杨励、罗颖主编:《极地研究与组织机构汇编(社会科学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李振福、李诗悦:《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发展脉络、支撑体系和学科发展》,第 113—158 页。

跨学科研究资源的“中山大学极地研究中心”,以及同年由大连海事大学发起、国内外 26 家理事单位参与的“东北亚北极航运研究联盟”等机构,均体现出鲜明的学术共同体意识。

其三,队伍成长。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北极研究队伍正在经历由少变多、由弱变强的成长。安琳曾在 2012 年撰文称中国极地科学家的数量增长很快,已从过去的 200 人或增至 1000 人,<sup>①</sup>这一估计应主要是指从事南北极研究的自然科学家。根据我在 2017 年初的初步考察,排除兼职的情况、不包括硕博研究生,在可称作“老兵”的各研究平台上,单个组织里以北极为专攻(包括兼顾南极研究)的全职研究人员至多不到 10 人,少则 1—2 人。因此,当时研究队伍估计在 60 至 70 人左右。考虑到人员流动的变化性,目前的总数大概不超过 100 人。

李振福等人梳理了截至 2020 年 3 月在中国知网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北极相关论文 5 篇以上的 25 位。<sup>②</sup> 国内同行信息,包括出生年份、所属机构、始发文年、发文数量、CSSCI 期刊论文数、被引次数、H 指数。他们认为,“中国北极问题研究从 2004(年)开始至今,已形成了结构合理、相对齐整的研究队伍,并且后备研究力量充足”。<sup>③</sup> 在后备研究力量的培养上,与国外大学和机构的联合培养模式也开始出现。比如,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与阿拉斯加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联合培养计划”在 2019 年秋季启动。

综上,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北极研究在知识产出上,增量可观但国际传播及其效果受限;在平台建设上,国内外之间连点成线、点面结合的特点突出,彼此的互动与协作增多;在队伍成长上,因人才培养周期的规律性作用,规模或在慢速扩大,结构也在慢速优化中。

雅各布森在 2010 和 2012 年的文章曾引用官方消息称,中国具备世界上最强大的极地科研能力,依据是中国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在“2019 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上明确表示:“目前中国已跻身极地考察大国行列”。<sup>④</sup> 2020 年“北极前沿大会”召开前夕,挪威极地研究所研究主任娜兰·科奇(Nalan Koc)在接

① Anne-Marie Brady, “Polar Stakes: China’s Polar Activities as a Benchmark for Intentions.”

② 原文是 26, 系序号标示有误。

③ 李振福、李诗悦:《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发展脉络、支撑体系和学科发展》,第 113—158 页。

④ 张建松、刘诗平:《中国跻身极地考察大国行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年 10 月 9 日。

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中国近年来加大极地研究投入力度的赞赏,称中国是北极研究知识库的重要贡献者。<sup>①</sup>若以极地考察能力建设为参照,中国科学界整体上进步显著,但若限定在社会科学领域,诸如“中国北极研究已经走到世界前列”的结论,应该说并不十分适用。

王:请问中国的北极研究大概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是什么?

徐:根据现有文献,王晨光依据样本文献的发表年份,将2007至2016年的中国北极人文社科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2007至2009年的萌芽阶段,2010至2012年的起步阶段,以及2013年至2016年的发展阶段,认为“北极人文社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前沿问题,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sup>②</sup>以论文发表量、研究议题的变化性及学者从事北极研究的连续性作为主要指标,李振福等人对2004至2019年的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做了阶段性划分:第一阶段2004至2007年,酝酿和聚集力量阶段;第二阶段2008至2011年,基本格局奠定阶段;第三阶段2012至2015年,从分散到集中的集聚阶段;第四阶段2016至2019年,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他们的研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极问题研究逐渐蓬勃发展,到最近几年已达到每年近200篇文献的发展高度,充分显示出中国北极问题研究的强劲力量”。<sup>③</sup>以文献为单一指标划分中国北极研究的发展阶段大概是不全面的,视野较窄、相对微观。譬如在语言表达上,用词的高度概括、抽象及语义的相近,导致上面两种划分在理解上都存在整体性含糊的问题,各阶段的界限不清。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北极研究“一般还是以事件激发性研究为主,研究的热度完全依赖北极问题的相关事件触动”,<sup>④</sup>这也体现在前面对北极研究最终出现时间的论证上。大致遵循外在驱动型的发展轨迹,在特定时间点出现的外在因素往往成为推动该领域研究呈现显著阶段性特征的“楚河汉界”,这恐怕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的最大特点。基于这一点,从中国本位出发,以中国—北极关系为标尺,以中国北极观的变化为线索,可以对中国社会科学

---

① 《挪威专家:中国是北极研究知识库重要贡献者》,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网站2020年2月3日, <http://chinare.mnr.gov.cn/catalog/detail?id=1ecb8a5eab4749eba0fbf47f53cf9047&from=zxdmttdt&currentIndex=2,2020-08-08>。

② 王晨光:《中国北极人文社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CSSCI期刊的统计数据》,第78—84页。

③ 李振福、李诗悦:《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发展脉络、支撑体系和学科发展》,第113—158页。

④ 同上。

领域北极研究的发展历程作如下划分:

第一阶段(2007—2012年),研究发轫,话语构建。2007年8月2日,俄罗斯科考队在北冰洋洋底的“插旗”事件,一度成为国内媒体重新发现北极的“新闻眼”。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一时事新闻进行应急式反应的舆论需要,催生了专论“北极争夺战”的学术期刊论文,“中国的北极人文社科研究也应运而生”。<sup>①</sup>

在2007年俄罗斯的“插旗”事件的启发和刺激下,从2009到2010年,国内学者的发文量成倍攀升,达到一个峰值。相关论文对北冰洋主权之争、北极相关的国际法、北极地缘政治竞争、北极国际合作、北冰洋通航、俄罗斯北极战略,以及北极治理等议题均有涉及。在这一阶段的后半段,国内学者以极大热情投入到中国北极身份的相关研究当中,因应当时中国北极政策话语构建的政策需求。2006年底,中国启动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观察员资格申请程序,这就在国内将中国以何种“名分”争取北极权益的问题提上了研究日程。2009年10月,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出席挪威年度北极事务论坛“北极研究之旅”(High North Study Tour),并做了题为《中国对北极事务的看法》的报告。<sup>②</sup>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侠被认为于2010年在国内首先提出“近北极国家”的概念,称中国是近北极国家。<sup>③</sup>2012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柳思思依据“环北极机制”提出“近北极机制”的概念,并给出判别“近北极机制”国家的三项标准。<sup>④</sup>根据外交部档案,最早对外用“近北极国家”提法的是前中国驻瑞典大使兰立俊,来自他在2012年11月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瑞典召开的一次观察员会议上的发言。其后“中国是近北极国家”的表述正式成为官方认定的中国北极政策话语,历史上首次明确了中国在北极的身份定位。

综上,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主要体现在国内同行在大众媒体推动下关于俄罗斯“插旗”事件的应急式反应。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关研究尽管数量少但却是真正意义上中国北极

① 王晨光:《中国北极人文社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CSSCI期刊的统计数据》,第78—84页。

② 宁宵宵:《地球未来的缩影: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谈“北极研究之旅”》,《世界博览》2009年第19期,第57—59页。

③ 陆俊元:《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第339页。

④ 柳思思:《“近北极机制”的提出与中国参与北极》,《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30页。

研究的发轫,并对中国北极政策话语的建构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相关研究使中国—北极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域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得到了双重确立,标志着中国的北极观出现重大转折。在这一阶段的前半段之前,对于中国各界而言,北极仍然是一个仅限于不定期科学考察的“他者”,北极是北极、中国是中国,二者并不同轨,但在后半段学术界和政策界在中国北极政策话语构建上的相向而行,最终使中国和北极开始成为一对(组)关系得以确立。

第二阶段(2013—2017年),进入角色,聚焦治理。2013年5月15日,中国最终被北极理事会正式接纳为永久观察员。与1925年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加入《斯瓦尔巴德条约》(亦称作《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奠定了中国与北极发生联系的国际法基石不同,该观察员资格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获得了在政府间高端平台上实质性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通行证”,丰富和发展了多边框架下中国—北极关系的合法性,并赋予了中国北极观以活力和从不同角度为其下定义的学术空间。借助这一事件的推力,中国在这一阶段对北极事务的参与逐渐进入了角色:一是自定义的“近北极国家”,二是被北极国家赋予的“北极理事会观察员”,三是融合了西方话语的“北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三者并行不悖。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北极研究也在此期间逐渐进入角色,主要表现在:继续拓展关于中国北极身份的思考和研究,同时专研中国在北极(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路径。

与前一阶段相比,此间关于中国北极身份的学术观点更为多元,主要包括:第一,“大北极”“大北极国家”与“大北极国家网络”。李振福关于大北极国家的选取原则,主要是从基本界定指标和竞争性界定指标两个角度,以空间距离、资源距离、人文距离、经济距离、政治距离、海运距离和 H-F(History-Future)距离等七种具体距离指标作了综合评估。<sup>①</sup> 第二,“国际公共品提供者”和“泛北极共同体”。2014年,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丁煌撰文称,中国应努力构建“国际公共品提供者”的身份,作为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途径。<sup>②</sup> 2016年,丁煌从建构主义角度,提出“泛北极共同体”概念并做了阐释。<sup>③</sup>

① 李振福:《大北极国家网络及中国的大北极战略研究》,《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第31—44页。

② 丁煌、赵宁宁:《北极治理与中国参与:基于国际公共品理论的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39—44页。

③ 丁煌、张冲:《泛北极共同体的设想与中国身份的塑造:一种建构主义的解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76—83页。

第三,“北极利益相关者”/“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这是继“近北极国家”之后关于中国北极身份的又一个官方表达,时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分别在 2015 年和 2017 年的北极国际会议上称“中国是北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王新和从国家利益视角分析认为,“北极利益攸关方”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塑性。<sup>①</sup>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阮建平认为,“北极利益攸关者”更符合目前的北极政治环境及其未来的治理趋势,有助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sup>②</sup>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凯和当时该校的博士生董利民等认同在国际上以英文“Stakeholder”(利益攸关方)一词界定中国的北极身份。第四,以“地图话语”对中国—北极关系进行重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何光强认为,通过地图进行话语重构也应是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路径。<sup>③</sup>

另外,2013 年的相关文献是 2012 年的两倍多,其中,近 50% 的论文是围绕北极航线经济性、可行性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以此为依据,有观点认为:“2013 年有两个事件对中国北极问题研究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一是中远集团的‘永盛轮’北极东北航线试航成功,二是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sup>④</sup>但从之后更长时间段的文献来看,以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荣休教授奥兰·扬(Oran R. Young)基于经验主义建构的北极治理理论为主流分析框架,北极航线问题并不是焦点,北极治理相关议题包括北极治理模式、北极理事会及有关国家参与北极治理的路径等占相对多数。

第三阶段(2018 年至今),反思沉淀,理论探新。2018 年 1 月 26 日,《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问世,重点阐述了以“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为核心的中国在北极的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以及“坚持科研先导,强调保护环境、主张合理利用、倡导依法治理和国际合作,并致力于维护和

① 王新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北极身份》,《太平洋学报》2013 年第 5 期。

② 阮建平:《“近北极国家”还是“北极利益攸关者”:中国参与北极的身份思考》,《国际论坛》2016 年第 1 期。

③ 何光强:《中国—北极关系的表达与分析:世界地图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38、47 页。

④ 李振福、李诗悦:《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发展脉络、支撑体系和学科发展》,第 113—158 页。

平、安全、稳定的北极秩序”等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政策主张。<sup>①</sup> 对于发布时机的选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在实践当中,中国已逐渐形成了北极各具体领域的立场主张和通常做法,具备总结提炼北极政策主张的基本条件。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实体不断增加、活动不断丰富,迫切需要加强政策指导,国际社会也一直希望中国尽快出台相关政策。<sup>②</sup> 白皮书引发了国外学界和国际舆论的热烈关注和讨论,国内学者多以解读白皮书的方式对事件做出直接回应。<sup>③</sup> 有鉴于历史上首份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本身的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的新阶段即第三阶段由此开启。

与白皮书是对中国北极政策主张的总结提炼一样,2018年以来国内的研究较以往更给人以“告一段落”之感。2017年适逢严格意义上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北极研究的第十年,国内学界刊发了五篇相关综述类论文,考察时间段大都集中在2007至2016年这十年。在这一波学术思考的影响和带动下,2018—2021年初,有九篇相关学术评述,这些评述从学科发展到理论方法角度对中国北极研究全貌更立体、更系统的综合和概括。其中,李振福等人试图对涉及北极研究的概念、范畴、命题、语言和术语等进行厘清和规范外,还提出诸如研究门槛、肩负使命和“中国北极问题研究能走多远”,以及构建中国北极观学理链等重要问题和观点。

与沉淀反思紧密相关的,这一阶段理论探新的自觉较以往更加清晰。其中,2016年,李振福等学者在梳理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从地缘角度出发,结合物理学中分子间的作用原理,提出“地缘势”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国家关系的演变过程即是国家间相互作用使彼此的“相对距离”趋于“最优相对距离”的过程,当体系中各国之间均到达“最优相对距离”时,体系将处于平衡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8年1月26日,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18203/1618203.htm>, 2021-01-23。

② 《外交部:中国发布北极政策白皮书是“水到渠成”》,央视网,2018年1月26日, <http://news.cctv.com/2018/01/26/ARTICgBN576Ode3w3jKumjCy180126.shtml>, 2021-08-10。

③ 参见杨剑:《〈中国的北极政策〉解读》,《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3期,第1—11页;李振福:《如何准确理解中国的北极政策》,《中国船检》2018年第3期,第37—39页;李振福:《〈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有明确国际法依据和现实基础》,《中国远洋海运》2018年第2期,第76—78页;卢纳溪、卢山冰:《中国的北极政策与与北极国家合作基础研究》,《新西部》2018年第32期,第79—80页;冯寿波:《中国的北极政策与北极生态环境共同体的构建:以北极环境国际法为视角》,《阅江学刊》2018年第5期,第96—108,146页;朱宝林、刘胜湘:《协调治理视阈下的北极治理模式创新:论中国的政策选择》,《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第38—47页。

状态。<sup>①</sup> 2019 和 2020 年,他们以现阶段北极地缘政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合作趋势明显为认识基点,以互联互通为思想主旨,在西方“陆权论”和“海权论”的基础上提出“通权论”,认为“北极命运共同体”将逐渐形成,国家间合作壁垒将降低,并将实现大北极网络发展。<sup>②</sup> 在对现有北极治理机制进行评估和反思的基础上,丁煌、朱宝林等学者在 2016 年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北极治理的机制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有利于在北极形成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新机制,从而实现对北极治理的进一步优化。<sup>③</sup> 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城市 and 区域科学学院教授杜德斌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等在 2020 年的研究论证了“冰冻圈地缘政治时代的到来”,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导致冰冻圈的快速融化,并由此引发对冰冻圈特别是北极地区资源和航道控制权的争夺,世界正进入一个由气候变化驱动的地缘政治时代”。<sup>④</sup>

总之,始于 2007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北极研究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相互联系,在研究内容上既有交叉也有延展、相互观照,比如话语构建从第一阶段延续至今。

## 二、国外学界在北极研究领域的进展

**王:** 北极地区曾是美苏冷战的前沿哨所,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和研究价值,在目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和疫情背景下的北极研究有哪些新动态和新进展值得关注?

**徐:**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北极地区在冷战时期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也受到重新审视,在疫情的语境中,北极安全相关议题的研究成为值得关注的新动态和新进展。<sup>⑤</sup> 这里简要地谈三点:

<sup>①</sup> 李振福、王文雅:《地缘势理论及其北极问题应用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16 年第 9 期,第 171—200 页。

<sup>②</sup> 参见李振福、彭琰:《“通权论”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第 23—32 页;李振福、崔林嵩:《基于“通权论”的北极地缘政治发展趋势研究》,《欧亚经济》2020 年第 3 期,第 25—38 页。

<sup>③</sup> 丁煌、朱宝林:《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北极治理机制创新》,《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3 期,第 94—99 页。

<sup>④</sup> 杜德斌等:《冰冻圈地缘政治时代的到来》,《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 年第 4 期,第 514—522 页。

<sup>⑤</sup> 徐庆超:《北极安全战略环境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04—124 页。

第一,安全研究范式的转移。如上,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大多数美国高层的安全战略和话语均清楚地确认了大国竞争的回归是当前主导性的安全研究范式。<sup>①</sup>这一范式同样体现在北极安全研究中:在关于北极地区“大国竞争”“地缘战略”“战略竞争”相关的话语建构方面,美国政界和学界起到了引领作用。2019年5月,在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之前,美国前国务卿发表演讲称“北极已经成为权力和竞争的竞技场”,北极地区已进入“战略竞争的新时代”。<sup>②</sup>为便于理解北极地区到2050年的大国竞争及其动力学,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希瑟·康利(Heather A. Conley)和该中心研究助理马修·梅里诺(Matthew Melino)试图验证北极地区大国竞争的两大驱动力,一个是军事发展,另一个是能源——该地区主要的经济驱动力。<sup>③</sup>芬兰拉普兰大学博士后桑娜·科普拉(Sanna Kopra)针对中国北极参与的风险和前景指出,“传统安全议题似乎正在北极事务中回潮,特别是由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正加剧的大国竞争,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中的权力转移。”<sup>④</sup>

第二,北极地缘战略新节点。对于过去大约十年里北极地缘战略环境变化的时间节点,康利和梅里诺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北极五国(俄罗斯、加拿大、挪威、丹麦和美国)于2008年5月28日签订《伊卢利萨特宣言》(Ilulissat Declaration)。该宣言赋予了北极沿岸国家在诸如外大陆架划界、海洋环境保护、自由航行、海洋科研及对海洋的其他使用等方面的应有权利;二是中国于2013年5月15日被接纳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Near-Arctic State),在北极地区实质性地增加了其经济和科研存在,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与俄罗斯在北极合作进行军事演习。<sup>⑤</sup>尽管康利和梅里诺并没有明确将2018年、2019年或2020年当作第三个或下一个北极地缘战略环境变化的时间节点,但该报告显然是对最近两三年的现实情形的一种写

---

① Rebecca Pincus, “Three-Way Power Dynamics in the Arctic,”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Spring 2020, pp. 40-63.

② Mike R. Pompeo, Looking North: Sharpening America’s Arctic Focus,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019, <https://www.state.gov/looking-north-sharpening-americas-arctic-focus/>, 2020-01-20.

③ Heather A. Conley and Matthew Melino, *America’s Arctic Momen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Arctic to 2050*,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0.

④ Sanna Kopra, “China and Its Arctic Trajectories: The Arctic Institute’s China Series 2020,”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china-arctic-trajectories-the-arctic-institute-china-series-2020/>, 2020-01-20.

⑤ Heather A. Conley and Matthew Melino, *America’s Arctic Momen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Arctic to 2050*,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0.

照,因为它是以美国前国务卿 2019 年 5 月的演讲作为认识框架的。康利和梅里诺的研究主观上既过分突出北极五国的地位,也严重夸大了中国因素,或以此服务于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near-peer competitor)和北极地区大国竞争的政治需要。

作为对相关研究的修正和补充,这一时期有三个时间点标志着北极地缘政治的显著变化:一是 2007 年 8 月 2 日的俄罗斯“插旗”事件,前文已多次提及;二是原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被并入俄罗斯联邦即“克里米亚事件”;三是美国前国务卿 2019 年 5 月 6 日在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前发表演讲,宣告“权力和竞争的新时代”在北极的到来。这些事件某种程度上撬动或影响着原有的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和走向。

第三,北极安全困境的想象。基于北极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的变化,这里有两个北极安全困境的场景想象:一是“新冷战”,另一个是“中美俄战略大三角”。与前面提及的仅限于中美的“新冷战”不同,聚焦在北极地区,参照美苏冷战史,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中俄为一方、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为另一方的“新冷战”。2020 年 7 月冰岛前司法部长撰写的《北欧外交和安全政策(建议)》表达了对大国政治濒临北极地区这一新态势的关注,北欧国家虽未完全把中国在北极的存在视作威胁,但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注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上升”。<sup>①</sup>

时至今日,在北极地区,俄罗斯超强的军事力量、中国显著的经济崛起,美国超群的综合国力,使人们对中美俄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想象变得强烈,可能成为未来北极安全困境的一种。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布·休伯特(Rob Huebert)提出的“新的北极战略三角环境”,是指中美俄三大国在北极地区的主要安全需求发生重叠。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助理教授丽贝卡·平卡斯(Rebecca Pincus)强调“中俄在北极合作对抗美国利益的潜力”,认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程度和范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合作意愿的强弱。<sup>②</sup>换言之,对中国而言,要在北极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会善用“俄罗斯杠杆”。可见,尽管中美俄三国实力不完全均衡,但中美之间、中俄之间、俄美之间都存在博弈,也可能发展为零和博弈,导致北极地区地

---

① Björn Bjarnason, *Nordic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2020: Climate Change, Hybrid & Cyber Threats and Challenges to the Multilateral, Rules-Based World Order*, p. 30, Proposals, July 2020.

② Rebecca Pincus, “Three-Way Power Dynamics in the Arctic,” pp. 40-63.

缘政治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震荡。

除了以上关于北极传统安全研究的新动向之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对该地区造成严峻现实威胁的大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对北极非传统安全研究愈加重视和强调,对安全和主权概念的讨论已经从主权安全延伸到环境安全,再到人的安全,尤其是与人们日常密切相关的安全和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等。比如,挪威南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夫·延森(Leif Christian Jensen)对“安全”对应的两个英文单词进行了区分,认为按照英文的习惯表达,“security”是“硬的”(hard),多指军事的(military),而“safety”是“软的”(soft),多指平民的(civilian)。<sup>①</sup>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助理教授威尔弗里德·格里弗斯(Wilfrid Greaves)基于安全化理论,对加拿大因纽特人和挪威的萨米人在安全概念上的不同表达和理解做了比较,认为因纽特人将环境和社会挑战也看作是安全问题,认为北极安全概念强调的是环境保护、保留文化认同,以及原住民政治自治权的维护,而萨米人通常不会使用安全化的语言去讨论环境和社会议题,也不将环境和社会议题看作是对他们生存和幸福的威胁。<sup>②</sup>基于此,无论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北极未来的“再安全化”(re-securitizing)从理论到实践都将更为全面、立体和复杂,值得持续关注。

在比较视野下,西方的北极研究积累早,业已形成相较于国内而言的研究特点和优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主要包括如下几点:第一,更善于创造新概念新理论引导研究议程设置,如提出“科学外交”“北极可持续性”等概念;第二,更注重对研究对象语言、文化及社会内在议题的掌握和了解,如对原住民经济社会生活的长期田野调查;第三,更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逻辑性,对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得心应手。比如,关于北极可持续性研究。

根据美国科尔盖特大学地理学副教授杰西卡·格雷比尔(Jessica k. Graybill)和美国爱荷华大学地理学副教授安德烈·彼得罗夫(Andrey N. Petrov)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西方北极可持续性研究(Arctic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ASR)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

---

<sup>①</sup> Leif Christian Jens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rctic: Norway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New North*, 2016,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p. 135.

<sup>②</sup> Wilfrid Greaves, “Arctic (in)Secur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Comparing Inuit in Canada and Sámi in Norway,” *Security Dialogue*, Vol.47, No.6, September 2016, pp. 1-20.

段:理解人类活动对北极环境的影响,聚焦生物地球物理过程及其对人类过程的影响;第二阶段:确定要素和联系,聚焦耦合的人—环境系统;第三阶段:塑造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恢复力要素,聚焦塑造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恢复力;第四阶段:应用基于社区和基于问题的路径,聚焦对科学的和传统的生态和(或)原住民知识的整合,创造协作的、互补的认知方法。<sup>①</sup>

### 三、中国北极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王:目前,中国的北极研究还有哪些不足?

徐:目前,中国北极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知识生产、学科建设、政策影响和议题设置等方面:

第一,在知识产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有一些非常具体但非常重要议题鲜有涉及,如北极地区的城市和农村社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原住民的食物主权问题,以及中国境内北极民族与北极地区原住民的关系问题,等等。

第二,在相关学科理论建设上任重道远。尽管国内外学界已进行了有意义的理论建设尝试,但通约性理论还没有出现,特别是关于中国与北极关系的理论阐释是缺位的。

第三,对相关部门和更大范围内公私部门决策过程的能动性影响有限,决策者对研究者施加的“反影响”和“反作用”反而更大。在研究中保持研究者和决策者的良性互动非常重要。

第四,在具体研究议题上,中国北极研究在以下三方面的观照尤为不足:

1. 对中国北极外交及其支柱缺少专门且立体的全面论述。北极外交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日渐上升,但现有研究在这一议题上缺少宏观把握,而多陷于琐碎。目前关于中国北极活动的讨论,往往是指中国在北极的科考活动、在北极理事会的参与、在格陵兰岛等地的商业投资类活动,以及与北极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关系等。其中也涉及中国外交的进展,比如中国与冰岛的北极合作框架协议的达成、中俄关于北极事务的不定期磋商等,其中

---

<sup>①</sup> Jessica K. Graybill and Andrey N. Petrov, eds., *Arctic Sustainability, Key Methodologies and Knowledge Domains: A Synthesis of Knowledge I*, Routledge, 2020.

每一部分甚至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但又是碎片化的,迄今尚未有对“中国北极外交”及其支柱从概念到实践的全景分析。在此议题上的不甚清晰、不甚透彻,难免影响到国内外同行对中国北极战略和政策的差异性甚至偏差性解读。

2. 现有研究对中国在北极的非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北极活动关注不够。一方面,现有研究关注了中国与北极国家间的政府外交,其中不乏中国学者就特定议题的英文发表,比如科学(技)外交,<sup>①</sup>经济外交及运用所谓软实力工具扩大中国影响等方面的内容,但关于中国在北极地区面向非政府组织、特定原住民组织及企业等所开展的非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缺乏严肃的整体性思考;另一方面,在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指导下,特别是以认定在中国政府、企业(无论国有还是私有)和社会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为研究前提,国外同行尤其,或者说极其重视中国作为国家行为体在北极开展的活动,有的甚至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也理解成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的有政治和军事意图的行为。目前对中国与北极的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国家层面,而没有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和市场层面,或即使涉及社会和市场层面,但也混淆到国家层面。造成这一缺憾的原因,或是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北极的数量少、不活跃,或是太低调,宁愿保持神秘,也不愿意被关注。

3. 国内同行较多地依赖文本做宏观的定性分析和战略判断,而缺乏对实地调研、问卷调查、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很多文献聚焦在资源开发、航道利用、北极治理、“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等,强调中国路径、中国作用、中国贡献等,这些研究议题本身很重要,但文章中却鲜见扎实的基于一手资料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对一些中国北极国际合作的细节不甚了了,甚至在统计数据、企业名称、对事件的描述、文献引用甚至政治立场等方面模糊不清、产生歧义。比如,在可看到的不同资料里,关于2013年“永盛”轮首航北极东北航道的起始点,有的说是太仓港出发,有的说是大连港出发,让读者莫衷一是。还有的对英文文献里的名称翻译出错,或者曲解了原意。这些看似细枝末节,却从根本上破坏了研究本身应有的信度。

---

<sup>①</sup> 来自中国学者的关于科学(技)外交的英文文献包括:Lulu Zhang, et al., “Reforming China’s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 Vol.44, No.3-4, 2019, pp. 387-401; Ping Su and Maximilian Mayer, “Science Diplomacy and Trust Building: Science China in the Arctic,” *Global Policy*, July 2018, pp. 1-6. doi: 10.1111/1758-5899.12576.

王:您认为北极研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议题?

徐:从学术创新特别从增进对中国—北极共生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的角度,有若干关于北极研究的议题值得关注。

第一,国内不同行为体(包括核心决策者、相关政府部门、学术界、企业界、主流媒体、普通公众)对中国北极政策取向的差异化立场。政策是动态变化的,2018年《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中国北极政策研究的终结。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迄今的国际反馈对中国北极政策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会有第二个白皮书会发布吗?中国北极战略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国内各北极利益攸关方,即不同行为体的参与甚或相互间的博弈过程。怀特虽然注意到中国国内关于北极政策的辩论,但仅限于对国内学术界不同观点的讨论,没有顾及所有或大部分的国内北极利益攸关方。挪威诺德大学副教授马丁·科萨(Martin Kossa)讨论了中国北极政策在政府部门间的成型,以及次国家行为体包括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经济和商业团体、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在政策制定及实施中所起的作用。<sup>①</sup>考虑到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及相互关系的复杂性,相关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第二,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下中国涉北极话语分析框架。中国北极政策从中国出发,影响北极、辐射全球,在该议题上的专研可以发现中国北极政策体系的历史演进及未来趋势,是理解中国和北极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北极研究的应有之义。可以看到,现有研究经常引用中国代表团在一些重要国际场合上的正式或非正式发言——从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和刘振民,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和外交部部长王毅,再到现任外交部北极事务特别代表高风,用以说明中国政府在北极事务上的立场和态度。但截至目前,相关讨论只限于引用,而没有成型的有理论支撑的分析框架。其中对中国北极政策的建言也仅限于某一方面,如中国如何参与北极理事会、中国如何与北极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开展合作,以及中国如何协助治理北冰洋污染等。基于外交学的新发展,中国北极政策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立体多维、与外界交互作用的系统,话语分析正是深化相关研究的重要方法,亟待

<sup>①</sup> Martin Kossa,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Arctic? Domestic Motives,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http://web.isanet.org/Web/Conferences/AP%20Hong%20Kong%202016/Archive/cbc09d1b-cf7b-4252-88f5-ca43776cbaa0.pdf>, 2021-01-27.

加强。

第三,根据北极地缘政治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研究,为将北极“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提供战略理论支撑。<sup>①</sup>自特朗普政府起,美国密集加强与格陵兰政府的政治、外交和商务联系,以实际行动鼓噪北极进入“战略竞争新时代”,并确立了“大国竞争”概念主导的北极安全研究新范式。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异动,可见一斑。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基于自身对华战略需求,在脱离中国北极行为事实和话语传达的基础上,企图将‘北极威胁者’的身份强加给中国。”<sup>②</sup>正如美国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孙韵(Sun Yun)分析的,所谓中国对北极国家构成威胁的论调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北极参与能力扎实评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中意图和发展潜力的猜测基础上。<sup>③</sup>对此,中国将北极定位为“战略新疆域”的相关政策和理论研究应予加强,不是仅局限在国家安全层面,而是更聚焦到各方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竞合层面。

第四,比较视野下的国别和地区研究暨在北极地区的北欧国家研究。在现有的中国北极研究中,较多的是对各北极国家或其他利益攸关方北极政策的描述性或阐释性研究,这固然必要,但同时导致读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各国家之间、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之间的政策差异和施政重点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归根到底,这是缺乏对北极国家内在性认知的必然结果。中国若要增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感和参与感,就应有意识地加大这方面的研究。从长远看,这有利于补齐中国国内的欧洲研究(目前以西欧和欧盟研究为重)短板,推动中国的北极研究占领学术新高地,使北极研究实现真正的学科化。

第五,以北极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为导向、以北极可持

---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网,2017年1月19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119/c1001-29033860.html>, 2018-09-27。

② 阮建平、瞿琼:《“中国威胁”的社会建构及解构对策:以国际传播对中国“北极威胁者”形象建构为例》,《国际观察》2020年第3期,第109—129页。参见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18, 2018;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rctic Strategic Outlook*, Washington, D. C., April 2019;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 2019; The Defense Department, *The 2019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rctic Strategy*, June 2019。

③ Sun Yun, “Defining the Chinese Threat in the Arctic,”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defining-the-chinese-threat-in-the-arctic/>, 2021-01-23。

续性(Sustainability)为内核,构建和统领中国北极研究的大框架。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北极事务的核心,国内北极研究迄今为止涉及的研究议题,无论是国际法、地缘政治,还是资源开发、航道利用、北极治理,抑或是原住民、国别政策、北冰洋渔业等,事实上是也应该是以北极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这些既有的学术进展也构成了宽泛意义上关于北极可持续性的中国研究图景。然而,在中国知网上以“北极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词的搜索结果显示,相关论文仅是个位数,可见相关研究还是一片“蓝海”。从提高北极可持续性研究在国内比重的角度,我们可考虑分三步走:第一,从北极可持续发展概念着手加强学习,尽快掌握相关知识图谱;第二,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增强有效学术对话的能力;第三,形成北极研究的中国学派,为实现北极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识。

王:您认为,中国有无可能和必要进行“北极学”的学科建设?

徐:在气候变化语境下,北极在地理上的特殊性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突显。全球性议题集聚在北极地区,使北极治理跨越了国别和地区边界,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全球范围内的北极研究从研究对象看,主要有三大板块:其一是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其二是人——特别是原住民,其三是人与环境——最紧要的是二者的交互作用。在此意义上,北极研究是对变化中的北极的专门研究,并不遵循某个单一逻辑,而是无数看似简单逻辑的复合体。或者说,在这里拟想中的“北极学”是对集历史感、现实感和未来感于一体的复杂“北极性”(Arcticness)的研究。基于这一推断,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这正是世界上没有出现自成一体的“北极学”的原因。但在西方有“北极可持续性研究”,它自然也是构想中的“北极学”的题中之义。

在实践中,国内同行对北极研究相关学科建设的探索已近十年。比如,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官方网站上“科学研究”栏目的下拉列表中有一个“极地战略学”,其“研究方向”定位是:“追踪和分析极地形势,研究极地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领域战略问题,为国家极地决策提供咨询。近、中期任务是建立极地战略研究学者网络、咨询网络、影响力网络和情报资料库,开展重要问题研究,打造极地战略研究智库。”<sup>①</sup>再比如,在学科建设上,李振福等人在 2020 年的研

<sup>①</sup>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网站, <https://www.pric.org.cn/detail/content.aspx?id=aa1aa644-5ee9-4872-8bd7-292a7af586da>, 2021-01-29。

究,认为“应打破学科壁垒,汇聚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学术力量,不断推进北极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建议在地理学一级学科下,设置北极地理学‘新文科’二级学科及相关专业。北极地理学下设北极法律地理学、北极政治地理学、北极经济地理学、北极文化地理学、北极历史地理学、北极战略地理学、北极环境地理学、北极生态地理学和北极社会地理学等学科方向”。<sup>①</sup> 中国海洋大学则实践先行,北极研究多年来被纳入极地与海洋研究范畴,学科范围涵盖国际关系、国际法、海洋可持续发展等专业,专业方向先是国际法,后是国际法与极地,授予法学学位。

以上实践探索和学术讨论,都在不同侧面有利于中国“北极学”的学科建设。在国内北极研究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北极学”或类似独立学科的设立还是有可能的,比如“北极战略学”“北极地理学”,或者基于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曲枫教授率先提出的“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框架”而产生的“中国近北极民族学”,<sup>②</sup>抑或是其他。

无论以什么名称在国内建立起一个北极相关学科,可能的路径或必然地包括以下两个:一是跨学科。必须要跨越不同学科的知识壁垒,文理交叉,使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原住民传统知识实现有机融合。现代科学在体系上越完备、在分工上越精细,在研究上越需要交叉,建立更全面、系统和立体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系统,以连接中国和北极,连接东方和西方,连接过去和未来;二是国际化。包括研究的国际化,成果可共享的国际化,以及人才培养和学术训练的国际化。国内外同行之间可以有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这是不同的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决定的,但跨国合作研究,以及用国际通用语言完成的成果可共享应更为普遍并受到鼓励。通过各类教育项目交换学生和研究者,使人才培养和学术训练在广受认可的知识体系和规范内完成,是建立全球北极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必须。

王:北极研究的前景如何?

徐:某一门类研究成为显学的条件,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研究本身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一定不局限于学术层面,而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社会进

① 李振福、李诗悦:《中国北极问题研究:发展脉络、支撑体系和学科发展》,第113—158页。

② 曲枫:《关于建立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框架的思考》,《渤海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1—7页。

步和普通人的生产生活。因此,北极研究在北极地区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原住民的关切又是极其具体和真切的,而不在那里生活成长的人可能就不容易理解那片极北之地上的人与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观;第二,研究的可持续性。只有个体研究者经年累月的投入和付出,以及研究群体跨世代的薪火相传,才可能使一门类研究持久发展下去。在这一过程中,只有研究对于研究者的引力和研究者面对挑战的耐力共同作用,才可能保证他们对北极研究的连续性;第三,成果可分享可应用。成果可分享可应用的关键在于,分享和应用的范围和程度。如果研究成果只限于在学术会议上同行间的分享和讨论,或只在政府部门制定行业规范时的有限应用,那么这一门类研究成为显学的概率就不大。

以上三点是某一门类研究成为显学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可能还有其他条件。应该意识到,某一门类研究成为显学是一个过程——一个可能是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过程,权且称之为“小众研究的大众化”过程。一定程度上,研究的大众化可以反映研究本身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可以鼓励和推动研究的可持续性,可以扩大研究成果的分享和应用范围,从而满足使研究成为显学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北极研究能不能成为显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未来 10—20 年内能否完成大众化过程。

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北极研究,促其大众化,务必重视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帮助国内民众发现北极、认识北极、保护北极。这些年来,中国在冷战后重拾与北极的关系,并不断扩大参与北极事务,在至少两个关键点上都有媒体的助力。第一,1991 年,科学家高登义在挪威科考期间第一次看到《斯瓦尔巴德条约》原文,第一次发现中国早已是该条约的缔约国之一,第一次得知中国同样有权利经申请在斯瓦尔巴德群岛上建立科学考察站、从事科学考察活动,于是经他积极呼吁,在国内媒体报道中陆续出现了北极相关消息。此举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北极科考,而且使普通民众的北极意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第二,2007 年,前文已经提及,正是出于应对俄罗斯“插旗”事件带来的媒体关注需要,催生了关于“北极争夺战”的学术讨论,某种程度上使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北极研究正式问世,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人 21 世纪的北极观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这些年来,国内媒体对北极的报道较以往多了很多,不仅有关于北极海冰融化的信息,也有大量的旅游资讯,还有关于北极国际会议的新闻及科普信息

等。比如,国内媒体正对航海家翟墨2021年6月30日从上海浦东开启的“人类首次帆船环北冰洋航海行动”进行跟踪报道。另外,也出现了关于北极的优质纪录片和电影,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分别在2011年和2016年制作的纪录片《北极之旅》和《北极,北极!》(Rediscovering the Arctic),以及在2020年12月公映的中国首部北极科考电影《光语者》。然而,仅从2016年纪录片的英文译名不难看出,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北极研究还是很小众的,普通民众对于北极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还停留在“极远、极荒、极寒、极光”的单一刻板印象上,亟须通过镜像“重新发现”。在发挥媒体的作用健全民众的北极意识、树立多元的北极观,以及引导普通民众认识到“北极就在我们身边”且“我们的未来决定于北极”并投身保护北极的事业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sup>①</sup>

综上,如果我们在未来10—20年里能善用媒体力量形成便利北极研究的舆论环境、社会氛围和市场需求,并对北极事业不断加大投入,譬如着力培养更多的极地探险家、观察家和社会活动家,那么,中国北极研究的整体能力不仅将得到快速提升,而且将成为全球北极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板块,北极研究进而成为显学的时机可能会比预期来得更早一些。

---

<sup>①</sup> “The Cost of Doing Nothing: Maritime Infrastructure Vulnerabilities in an Emerging Arctic,” A Testimony by Heather a Conley,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8 2019, <https://transportation.house.gov/download/conley-testimony>, 2021-01-30; Durwood Zaelke, “Paul Bledsoe: Our Future Depends on the Arctic,” *The New York Times*, pp. SR-9, December 15, 2019.